



环视当今艺苑,几乎每位书画家都有几枚闲章。闲章是窥视艺术家内心世界后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或艺术追求的脚迹。诚如韩天衡先生所言:(闲章)“已成为一个内容包罗万象、多姿多彩、足堪从文学及印艺上作双重咀嚼的勃兴品类”。管继平兄专门撰写了一本《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将罗振玉、陈师曾、鲁迅、李叔同、郁达夫、闻一多等半百名流的名章、闲章“一网打尽”,通过点点朱迹,将他们治学、从艺、生活日常等故事讲得十分有趣,上架后很受读者喜欢,一版再版,也折射出闲章在当今文化语境中的“感光度”。

戴敦邦的三枚闲章

沈嘉祿

海上名家戴敦邦用过多枚闲章,其中三枚闲章钤用频率最高,在画作上留下了数十年艺术耕耘的心迹。

二十多年前我在劳动报文化新闻部当主任编辑,有一天摄影记者拿来一张新闻照片:戴敦邦参加人民公园的一个新书签售活动,读者将他团团围住,气氛热烈。同时出席活动的还有几位画家,他们的台卡上写着头衔加姓名,只有戴先生的台卡与众不同,是

“民间艺人戴敦邦”。照片上戴敦邦乐呵呵的,仿佛对这个称号相当满意。

在艺术圈的话语体系中,“民间”意味着在野,与“庙堂”对应,处于非主流地位。戴敦邦曾受聘于交大,是名符其实的教授,这“民间”两字是他的自许,而非别人的“加冕”。

早在1979年,戴敦邦随中国美协代表团远赴西北采风写生,在西安、甘肃、敦煌、山西等地的寺院、洞窟观摩了许多民间艺术遗珍,这些精美的壁画、泥塑、木雕等绝大多数没有留名,不知作者是谁,但经过岁月的淘洗,仍然感动到每个审视者。戴敦邦认为它们共同拥有一个不朽的名字——“民间艺人”,回上海后就请人刻了一方闲章:民间艺人。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和警醒。

如果说“民间艺人”体现了戴敦邦的文化自觉和民间情怀,那么他的第二枚闲章则记录了一段生命历程。进入新世纪后,戴敦邦受有关方面委托,赶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前,创作了煌煌巨制《辛亥革命人物百图》。因为时间过紧,任务过重,用力过猛,导致眼球大出血,至使他右眼完全失明,



标本·中国美术史一山水卷 (手卷局部) (中国画) 何曦

左眼严重损伤,这对一个以绘画为终身追求、为生命价值的画家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啊!但戴老相当乐观,照样笔耕不辍,并于自己取了个雅号:“一目山人”,还请人刻了一方闲章。

“鍊师娘”周鍊霞曾经有两方闲章,一方为“目眇眇兮愁予”,另一方为“一目了然”,不少人都知道为何来。但戴敦邦的“一目山人”显然承载着不一样的时代风云,他在钤用这方闲章时,底气十足,壮阔豪迈。

戴敦邦擅长人物画,被辽宁著名画家王弘力誉为:“现代任伯年”;叶浅予也有过很高的评价:“运用中国画的造型用笔,描绘历史故事人物,戴敦邦是当今独树一帜的高手。”他为电视连续剧《水浒》创作人物形象造型,等于为这部作品“一槌定音”。其实他对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和《金瓶梅》等都很喜爱,都以绘画形式演绎过,而与《红楼梦》结缘又超过四十年。

1977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版,戴敦邦为译作配了36幅彩色插图,便于外国读者理解小说的情节、人物和文化背景,此后他又创作了白描组画《红楼梦人物谱》、《红楼梦群芳谱》以及连环画《红楼梦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事》等。最重要的一次是在世纪之交,耗时整整两年完成了240幅《新绘红楼梦》全图,全景式地再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因为画《红楼梦》,戴敦邦又多了一枚闲章。那天在老爷子的画室,他跟我说起由来: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家道已经衰败,居住在京城西郊,自称“举家食粥尚常称”,后来得到王族公子敦诚、敦敏的慷慨资助,才得以完成这部“世巨制”。“我的姓名中也有一个‘敦’字,所以我就将敦诚、敦敏两位引以为穿越时空的知己,自称‘三敦居民’,请人刻了一方闲章,经常钤用在红楼梦人物图上。”戴敦邦说最后又补了一句:“本来想刻‘三敦居士’的,后来觉得有点酸,干脆就叫‘居民’吧,我与敦诚、敦敏两位穿越时空,成了同一小区的居民。”

十多年前戴老爷子还画过一幅漫画发表在《新民晚报》上:他在敦诚、敦敏两位的引荐下拜谒曹

想想也对,不过终究有些心虚,从来没有不买票乘公交。坐下来以后不停折腾手机,想把问题找出来。不知不觉到了浙江大学附中,这里要转车,又上了87路。只好又掏出那张5元纸币,刚要投入票箱,司机挥手,说算了,下次身上准备点零钱。心里暖洋洋的,钱不是重点,暖心的是杭州公交司机的与

九溪十八涧的心情

梁永安

人为善。

在87路车上坐定,望着去龙井的山坡路,草木菁菁,茶树行行。突然想到:去年来西湖,好像用另外一个手机申请过杭州电子公交卡,怪不得现在用这个手机申请不了。顿时浑身都是惭愧。正想着,公交车已经开到龙井,快步走到票箱前,要把5元纸币丢进去,不能因为自己的问题白坐两趟公交车。司机急忙拦住,笑着说“不用了不用了”。不好意思向他解释为什么,只是坚决把钱放进钱箱,还对他谢了又谢。乘客们都笑起来。

就这么暖洋洋地到了龙井,直接先到老章家,喝着新茶拉家常。采茶季的最后一天,老章夫妻和女儿女婿都在。说起今春的龙井茶,老章女儿说产量低,主要是偏冷,茶叶长不开。采茶要雇江西来的女工,一天工钱150元,还包吃包住。一个人一天大约采5斤鲜茶

叶,炒制出来只有1斤成品茶,大约卖三四百元,算上一年的成本,几乎不赚钱。茶饮也不容易啊!我说,明年我带新研究生来采茶,让她们体会一下茶乡的生活。老章连连摇头,说这不行,现在的年轻人吃不起这个苦,从太阳出到太阳落,很难坚持。

离开老章家,沿着九溪十八涧走了个来回。最近没下雨,溪水不多,但心情与以往一样,山高水长滋味百般。这条山里路走过多多次!雪天、雨天、雾天、晴天,春夏秋冬都经过。年年岁岁,山林都长满了眼睛,互相漾着笑容。走在路上,时间是心里的溪流,每一块石头都是记忆。

身后传来摩托车的声响,回头看,竟然是一个快递。前面正好是一道溪水,水下是大块大块的石头,他怎么过去呢?果然,他骑着车被卡在在了水中间,动弹不得。匆忙上去,使劲帮他推车。他回头苦笑,说第一次走这条路,不知道这么难走。我说这可不是摩托车走的路,既然来了也退不回去,还是尽量向前走吧。他下了车,两人一起左推右拉,好不容易过了水。他连声感谢,又骑着走了。我大声说前面还有十来道水,不行就等着我。

看他远去,有些感慨:生活就是这样,已经出发了,就得咬着牙向前走。向前要吃不少苦,但终究有股劲头,一后退,人生的精神就全没了。不是前路选自己,而是自己选前路,两者看上去差不多,本质上差远了。生命的重量,有时就在这有意无意之中。

早年的外滩,银行林立的“风水地”,资本竞逐的“冒险场”,有“东方华尔街”之称。1949年5月26日凌晨,苏州河南岸已经迎来胜利的曙光,而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仍在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枪炮射程之内。天际露出鱼肚白,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外墙悠然亮出一条“庆祝大上海解放”的巨幅标语,令过往市民欣喜不已。这也许是外滩出现最早、悬挂最高的迎接上海解放的标语。

知情人都晓得,眼前这一切,是由潜伏在外滩银行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悄悄策划的,领头人便是中国银行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潜伏在外滩“华尔街”

黄沂海

项克方。上世纪30年代初,项克方先后在协鑫银号、中国银行松江办事处谋职,愿受长缨,积极参加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上海市银钱业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变身孤岛,项克方在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银钱业界总委员会书记张承宗的介绍下入党,从此,这位外表儒雅、待人谦和的银行先生成为一颗红色的种子,在银行圈里应外合发展党员,很快成立了地下党支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引导下,项克方与几位地下党员以“勤力勤学交朋友”的策略,分别加入由银行当局举办的“英语学习班”、“读书合作社”、“同人同乐球艺部”等社团组织,创办了《书声》刊物,以此为掩护开展宣传推动工作,编织起一条地下党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重要纽带。

由于时局动荡,法币贬值,银行职工的收入不增反降,群情激愤,怨声载道,项克方认为发动群众与资方进行斗争的时机已到,经过一番周密部署,采用联名签名的方式递交中国银行高层,提出“物价上升,而待遇依旧”,要求增加工资,全行有40%的职工签名请愿,迫使资方让步,初战告捷。抗战胜利后,不少滞留孤岛的银行老员工背负莫须有的“汉奸”“伪员”骂名而被打入另册,

在“反歧视”、“反甄别”的斗争中,项克方广泛发动,要求银行方面承认抗战期间滞留上海的银行员工的正式身份和资历,取消朝不保夕的生活费,发给固定薪金,与资方进行不屈不挠、富有韧性的交锋,赢得了主动,收获了民心。

申城破晓前夜,中国银行地下党支部建立了“行员工应变互助会”,号召职工群众竭力守护银行财产,保存档案资料,诸如房地产、库存现金、业务帐簿、人员履历表等内容,为人民政府接管做好充分准备。5月27日,先期撤至苏区的项克方随军重返外滩23号,闻讯赶来的银行职工瞬时将

营业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与他热烈拥抱欢庆胜利。只花了不到十天时间,沐浴着新时代春风的中国银行恢复对外营业了。

在这条潜伏在外滩金融街上,为党秘密工作的银行家不胜枚举:留美归国后被中共中央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之后出任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冀朝鼎,利用其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员的机会,为党组织传送了大量重要的金融情报,牵线搭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等紧缺物资,掩护了许多地下党人士在沪施展身手;与爱国实业家联手创办建业银行上海分行的龚业冰,在银行业务掩护下为党尽心尽力,集聚金融服务支持有中共背景的华商企业,还负责上海三处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讯联络,其中一处即为后来英勇就义的李白烈士所负责的电台;被誉为“金融界之莲花”徐奇勋,出污泥而不染,出任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团结金融工商界人士,投身抗日爱国洪流,并暗中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为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志士予以经费援助……

传奇外滩,静水流深,时刻涌动着潜滋暗长的革命激流。

十日谈

上海的早晨

责编:龚建星

伴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枪炮声,钱庄业何去何从?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征文启事

家长和孩子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然而,倘若从“发现儿童”的角度出发,在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家长不仅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

儿童节十日谈主题:“孩子教育了我”,写写你在不经意间对孩子的新发现,孩子对你的影响和改变

要求:1200字以内
截稿期:6月1日
投稿邮箱:hongse@xmwb.com.cn。

中午11点半到达杭州东站,专车如约而来,顺利坐上,前往西溪湿地。

司机是位三十八九岁的杭州本地人,对杭州很有感情。她说:“前些天清明长假,我开车过黄龙那边,忽然看见路边一对夫妻大声喊着叫车,根本叫不到。男的还背着个小男孩,已经昏过去了,发急症。女的跑到我车前拍窗玻璃,哭着说请我救命送到医院去。听口音是河南那边的,头一次来杭州。我一看情况紧急,让他们赶紧上来,加快速度跑。遇上一个红绿灯,闯过去要扣3分,还要罚款。正好路边有警察,我说车上有昏过去的小孩,我能不能闯红灯去医院?警察看了看,使劲挥手,让我快些开。”

“这警察真好!后来孩子怎么样?” “送到医院后我就知道了,他们两口子在后座放下100块钱,抱着孩子就往里跑。我抓着钱追他们,说我今天就是救人,不要这个钱,他们一把又塞给我,继续往医院里冲。”

听了好感动。车开到西溪的宾馆,放下行李就出门,去龙井村走一走,喝杯新茶。宾馆附近有118路公交车,一上去傻了眼:手机上怎么也调不出支付宝乘车码。30岁左右的男司机侧着脸看过来,不断提示如何操作,可手机上还是显示“已经申请过虚拟卡,不能重复设置”。没带零钱,干脆投一张5元的纸币,省心省事。没想到司机笑笑说:“算了算了,你又不是不想用手机付钱,可能是电子公交卡的程序设计有问题,别付了。”

甘露是一种茶,产于四川雅安,名曰“蒙顶甘露”。唐代白居易就有“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颂之。茶圣陆羽也有天下茗茶“蒙顶第一”之句。近读许倬云先生《江河万古》提到,茶作为饮料,于南北朝时已经风行。茶的原产地是中国西南部,汉代的“槲”,实是茶的原名。在王褒的《僮约》四川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的茶已是商品,则饮茶也可能在汉代已是常事。蒙顶甘露型似碧螺春,汤色与滋味亦近,大概因后者颇具江南之秀润,故味道略淡而已。碧螺春物稀为贵,而蒙顶甘露成为很好的替代物。

甘露是一出戏,即《甘露寺》,这是京剧《龙凤呈祥》中的一折。《龙凤呈祥》是逢年过节必演的剧目,梨园界称“吉祥戏”。其中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尽显京剧唱念做打之特点,是鉴赏京剧很好的入门剧目。不同演员有不同版本,京剧大师李多奎、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梅兰芳等均在戏中有突出表现。其中《甘露寺》一折即为刘备过江招亲与东吴太后相见甘露寺中的场景。

甘露是一件历史事件,即唐文宗时的“甘露之变”。近读《李商隐选集》(周振甫选注),李商隐《有感二首》其一就提到“甘露之变”。太和七年(833年),文宗得风疾,太監王守澄推荐郑注为文宗治病。郑因文宗病愈而得宠。之后郑向王推荐李训,后者亦得文宗恩宠。后来文宗见宦官日益专权遂令郑、李两人联手除之。一日文宗在紫宸殿上朝,韩约奏称金吾仗院石榴摧,夜有甘露,文宗令宦官仇士良等同往观之,四下安排人手欲除仇,不料被仇查破,大举未果,参与计划的大臣多被仇迫害。自此宦官专权变本加厉,迫胁天子,下视宰相,成为晚唐政坛之大弊。

甘露是一块砖砚,余藏甘露元年砖砚,小巧可人。砖侧有“甘露元年”四字。“甘露”是汉宣帝的年号,迨来两千多年。砚之天地盖如同人之衣裳,既为美观又为实用。在天地观上穆师为余书写“四时潇洒”四字,砚身一侧有其书“瓦甃当存道”,另一侧则为余画梅一支。另倩棋文、戴阳二君为余铭刻,古意盎然。砚铭需要通过拓片来表现,拓片则需要题跋来增辉,予穆师为此砖拓片题字“汉甘露元年古砖砚初拓本”。此汉甘露年砖,铭文若此小而精者极少见也。凿池为砚,当是文房之珍也。此砚为之吴弟所藏属铭绘之。时戊戌十月,西泠印社一百十五周年庆典归来,予穆”。

何为甘露

施之昊